

他们从海外“追”回文物，分秒必争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黄晓颖
记者 蒋肖斌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帛书——子弹库帛书，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搁浅”。这些战国时期写在绢帛上的文书，1942年在长沙东南郊子弹库土坡的一座楚墓中被发现，又在4年后被盗运至美国；直到今年5月，其第二、三卷才回归故土（子弹库帛书分3卷，此次回归的《五行令》和《攻守占》为第二卷、第三卷——编者注）。

作为目前出土的唯一战国帛书，它比马王堆汉墓帛书早约300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代学者执着地对它展开跨国、跨世纪的研究。古文字学家曾宪通曾说：“几乎没有一件中国文物像它这样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对它的研究历久不衰。”来自遥远故土的千万双眼睛，从未离开过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正是注视它的人群中的一员。他参与的文物追索工作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穷尽现代文明的方式，让流失文物有尊严地重返故土。在霍政欣看来，中国的流失海外文物追索工作正在变得更主动，“每年都有一些标志性文物返还”。而子弹库帛书则是中国主动追索历史上流失重点文物并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霍政欣说，文物追索工作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努力。他常告诉身边的年轻人，“要多些耐心”，但他也强调，文物追索同样需要“分秒必争”。

十年

2015年春天，霍政欣受邀录制一期关于章公祖师像追索的节目后，主持人白岩松和他约定，“等文物回归，我们再做一期节目”。10年后，这个约定还没能履行。在追索工作中，挫败比子弹库帛书这样的成功更常见。

“我们做了很多（文物追索）案子，但是最后能实现（文物）回归、被公众看到的，其实是凤毛麟角。”霍政欣的学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青年教师陈锐达说。

事实上，与“年”相比，“小时”是他们工作中更常见的时间单位。通常来说，一件流失文物的拍卖消息是一条追索的重要线索。从获知消息到文物上拍卖台的短暂时间内，中国文物追索团队就像在完成一台手术前的多学科会诊：依据历史、文博专家构建的“非法流转证据链”，法学专家需要快速研判，出具法律意见。

霍政欣是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的那个人。2019年，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追索中，团队提交法律意见用时不到24小时。他提到，一些国家的国内法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这也意味着，如果有买家拍下流失文物，会给追回文物增加更多难度。

因此，理想情况是，在文物被摆上拍卖台前就将其拦截。陈锐达将这个过程描述为“生死时速”。在他参与的文物追索工作中，最紧急的情况是“两个小时答复”。

在文物追索团队的工作，有时让陈锐达想起在律所的实习，“团队在讨论时，其实绕不开一些法律的基本问题，方法论是接近的，这可能是一些共性”。不同的是，做律师要考虑“怎样为当事人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文物追索工作的复杂性在于，他总要站在“国家大事”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考虑文物回归背后，国家之间的关系，“你做的每一件事，你完成的每一个案子，都会对后面的文物追索工作产生影响，甚至对整个国际趋势产生影响”。读博期间，陈锐达参与“国家大事”，在这份“急”与“慢”



①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②子弹库帛书中的《攻守占》残片，红字由朱砂书写而成。《攻守占》是战国时期融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与军事兵法的古代文献，为研究古代哲学与兵法思想的重要原始资料。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③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 国家文物局供图

交织的工作中锤炼，他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陈锐达认为，师生们在做“不是立马就能见效的事情”，他难以用语言形容，“好多年前我们写了一份文件”，到未来某刻真的推动了一件文物的回归，会有怎样激动的心情。

“追”了文物16年的霍政欣，对“急”的理解不止在一件件紧急任务里。他感受到个人精力的衰退，想尽可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促使更多文物返还，但他也很清楚，文物追索“我们这一代人肯定完成不了”。2014年，霍政欣就参与起草旨在推动非法出境被盗文物的保护与返还的《敦煌宣言》，那时候“做人的还很少”；而10年后主持起草《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以下简称《青岛建议书》）时，他身后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学生。

与时间的另一场赛跑是与证据消失竞速，霍政欣太明白及时开展溯源调查对文物追索的意义。以子弹库帛书为例，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子弹库帛书，多次往返中美两地，历时40余年完成了对它的“身世”调查。依据李零关于子弹库帛书的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成果，中国国家文物局于2023年年底就子弹库帛书的非法流失形成扎实完整的证据链，经多番沟通与协商，最终实现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五行令》《攻守占》的回归。

霍政欣坦言，能碰到李零那样完整、系统的研究非常难得，越往后，找到流失文物来自中国、非法流出的证据会越来越困难。

霍政欣坦言，能碰到李零那样完整、系统的研究非常难得，越往后，找到流失文物来自中国、非法流出的证据会越来越困难。

正义

在文物回归的几种形式中，“依法索回”的受关注程度曾一度不如国家购买、民

间购买和捐赠。这让霍政欣痛心，他说，中国人竞拍、花高价买回流失文物反而会让西方拍卖机构正中下怀。监测拍卖线索追索文物的方式，他同样认为相对被动。

近年来，中国在文物追索方面的探索变得更为积极主动。2019年，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2024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是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主责单位，同时规定其有权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追索工作，搭建了非法流失文物追索的工作机制，同时还规定“国家对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受时效限制”。

“时效限制”曾一度阻碍文物追索团队的施展。目前，国际上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公约》）。

这意味着，《1970年公约》生效前因战争劫掠、盗掘、非法转让及走私等不法原因或不道德手段被转移到中国国境的文物，即历史上流失文物，不在公约约束的范围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私法研究室主任李庆明直言，“实际上中国大量的文物都是在1970年之前就非法流失到国外去了”。2024年文物保护法的修订，正是通过国内法突破时效限制，为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提供了法律支撑。

在国际上，纠正历史、道德返还也越来越得到认可。李庆明认为，虽然有时效限制，但《1970年公约》对非法流失文物持有国施加了压力，为文物流失国带来了一定道义与舆论优势。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联合发布《青岛建议书》，进一步鼓励各国和文物持有者认识到殖民获取的非正义性，鼓励各国及相关机构在文物保护、研究、返还及后续利用等方面加强对

话沟通与互动合作。

2024年4月，美国国际法学会第118届年会召开，会上专设了“中国被掠夺的文化遗产：历史的不公与当前的困境”论坛，霍政欣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令他意外的是，观众中有美国学者和官员，也有来自国际组织以及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众多学者与官员。他发现，主要殖民背景文物持有国也在积极制定和修改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殖民背景文物归还问题的妥善解决。

霍政欣认为，在文物追索返还中，双边合作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也是“主动”的体现。子弹库帛书返还的前提是2009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方和《五行令》《攻守占》持有机构——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双边谈判。

他指出，文物返还领域的稳定合作已经成为严峻复杂的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双边合作“针对性很强、可操作性强”，难点则在于需要一个个国家突破。李庆明将之形容为“通过合作的返还和通过返还的合作”，“让对方既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与善意，通过合作促成返还，返还后进一步在研究方面和其他领域加强合作”。

“不是所有的中国文物都要返还，历史上大量的中国文物通过正常贸易运到西方，是文明交流的纽带。我们追索的是非法流出的文物。”霍政欣指出，这些文物的返还，是纠正不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必要举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他呼吁日本尽快返还侵华期间劫掠的文物。

师徒

陈锐达无法以历史研究者的口吻解释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但当 he 谈到帛书“流失到海外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被公开展出

过”时，带着一时略失理性的委屈。

他的老师年轻时也有类似的不忿。2009年，还是一名国际法青年学者的霍政欣得知，世界知名拍卖公司“佳士得”在法国巴黎拍卖1860年英法联军自圆明园掠走、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这是他关注文物追索返还的起点。

“当时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表态，都说这是英法联军劫掠的中国文物，应当返还，我很不解，既然应当返还，为什么对方不返还？”从这个学术疑问起步，霍政欣了解到，当时国内几乎无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用一种民族情感在代替理性的法律作回答，就说这是被强盗抢走的，理应返还，但实际上对于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研究还是比较浅的”。

在认知里建立起文物回归与国际法研究之间的关系，即便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一道难题。本科期间，陈锐达上过霍政欣的国际私法课，霍政欣是公认讲课很好的教师，会在课堂上穿插着讲一些自己在流失文物追索方面的研究。陈锐达对他的研究领域好奇，找来他写的专著《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但不太能看懂。

“一开始我会很好奇，文物追索工作跟国际法有什么关系？以为这是一个外交事务，大部分情况下可能通过外交协商就可以实现，那国际法发挥了哪些作用？”陈锐达说。更何况，没有研究基础的人在法规里甚至“看不出来文物两个字”。

直到加入霍政欣团队，开始做一些基础研究后，陈锐达才慢慢发现：文物追索是一个需要由国际法来解读和提供支撑的。

霍政欣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他们需要证明一件文物在何时间阶段以何种方式流出，违反了当时中国的什么法律，流入另一国家，又违反了当时该国的什么法律。“经常要把中国民国时期的法律找出来作研判，有时候有些国家历史上的法律都



①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②子弹库帛书中的《攻守占》残片，红字由朱砂书写而成。《攻守占》是战国时期融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与军事兵法的古代文献，为研究古代哲学与兵法思想的重要原始资料。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③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 国家文物局供图

找不到。”

研究早期，陈锐达会陷入对某个法律问题“无解”的痛苦。霍政欣提醒他，误区在于“先入为主，带入了中国法律视角去理解日本法”。团队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在实战中理解，文物追索“不是一个机械适用法条的过程”。

这对师徒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霍政欣一直认为法学要解决社会问题，不满足于只做理论研究；陈锐达学习法学是为“匡扶正义”，他坦言自己受导师影响很大，文物追索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某一个领域维护公平正义”。陈锐达毕业后在大学任教，还坚持在霍政欣的团队参与文物追索，并凝聚更多人加入。

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为团队带来了不同学科的视角，他们也有了人手去持续关注和分析国外文物追索的动态。陈锐达说团队有了经验传承，追索工作会越来越越好。“当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可以立刻反应，应该从哪方面入手”，迅速且有效的反应，为其他环节争取了更多时间。

这对师徒都提到了“个人的幸运”，这恰好是文物追索领域两代国际法学者的人生轨迹：前者的十余年学术生涯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文物追索能力不断增强，“自己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正好能够发挥作用”；后者的学业遇上中国文物追索的“黄金期”，得以接触大量案件，这期间也是世界流失文物返还的新浪潮。

归 来

霍政欣“10年之约”的主角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案件虽然胜诉，但判决仍处于域外执行阶段，霍政欣对它的回归持乐观态度。该案开创了民间通过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新途径，但它的耗时耗力让霍政欣认为，与更多国家签订和实施双边协议才能提高文物追索效率，“找准路径，中国文物能够实现加速回家”。

今年5月，《1970年公约》第八届缔约国大会在巴黎举办，中国首次当选为缔约国大会主席国。霍政欣在很多场合提到，这表明我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贡献度、影响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今后中国在《1970年公约》的相关讨论事项的设定、大会议项议程的设定，都将有更多话语权，所以我想中国在本领域就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他也指出，中国在文物追索机制解决方面也在继续探索和创新。5月30日，《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在中国香港举行。国际调解院由中国等19个国家共同发起，是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霍政欣一直期待，国际调解院日后能够把国家之间的文物追索纠纷纳入调解范围。

围绕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复原正在加速突破。今年1月召开的甘肃省文物局长会议透露，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已获取海外藏高清图片10万余张；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已利用三维扫描技术，将流失海外的90多件天龙山造像数字化复原，并实现11座主要洞窟的数字复建；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完成对6件流失海外近百年的造像和造像残件的3D打印复原……

霍政欣认为，数字化复原是推进文物追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努力，“不是数字化回归”。陈锐达告诉记者，文物追索团队的工作也涉及数字化复原中采集数据的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在文物回归的条件还不成熟时，数字化复原能为后人提供更多途径来了解这些文物，但“恢复历史正义”的追求没有改变，追索工作的核心还是在于文物所有权的回归，这代表非法流失文物持有国“对历史不法行为的承认”。

陈锐达谈到自己曾参与追回的天龙山石窟佛首、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方式，和其他参观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公开展览中，在人群里，这位推动文物回归的“功臣”之一，往往需要压制住喜悦才能静静观赏。

参与文物追索之前，陈锐达本就是个逛展爱好者，在未来的博物馆展览中见到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和更多未回家的文物，现在都在他的计划清单里。



革命文物中的文学课·抗战

□ 姚 明

1938年深冬，桂林城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下化作一片火海。巴金站在月牙山上，这位以笔为剑的战士目光穿透“半个天空的黑烟”，凝视着这座正在被烈焰吞噬的城市。火光映照着他坚毅的面庞，也照亮了他手中那叠辗转万里、沾满硝烟气息的稿纸。他深吸一口气，再次俯身，继续书写那部在战火中孕育、在流离中成长的长篇《火》。

跨越五年辗转万里，在炮火与流离中诞生

巴金创作《火》的过程，堪称一部在铁与血中书写的抗战文学创作史。1938年5月，广州城上空敌机盘旋，爆炸声此起彼伏。巴金就在这“几乎每天都有空袭”的恐怖氛围中，于轰炸的烛光和作家紧锁的眉头下，于轰炸的间隙，在临时栖身的陋室里，写下了小说的前三章。

每一次凄厉的警报响起，他不得不中断思绪，匆匆收拾稿纸，躲进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洞外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和房屋倒塌的声音，洞内是摇曳的烛光和作家紧锁的眉头。这种在死亡威胁下抢写篇章的坚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以文化抗战、以笔为枪的生动缩影。

4个月后，当巴金从战火纷飞的汉口冒险返回广州，准备续写第四章时，战局已

巴金《火》：全民抗战 浴火新生

急转直下。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兵锋直指广州。城市危在旦夕，巴金被迫再次踏上流亡之路。他怀揣着未完成的手稿，如同保护着珍贵的火种，在混乱中撤离。

同年12月，他抵达桂林。然而，安宁只是短暂的假象。12月24日，桂林遭遇了惨烈的第四次大轰炸。那晚，巴金站在高处，目睹了全城陷入火海的炼狱景象，“黑烟中闪烁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吞噬着房屋、街道和无数无辜的生命。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哭喊声、爆炸声交织。就是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巴金强抑着悲愤与恐惧，再次提笔，让笔下的人物在虚构的世界里继续战斗。这种直面惨淡、于绝望中坚守希望的精神，正是《火》这部作品最深沉的力量源泉之一。

1940年7月，巴金辗转至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的相对宁静并未带来真正的创作自由。日伪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的监视和搜查，像无形的枷锁。他只能在租界的夹缝中，在高度警惕的状态下，艰难地继续《火》的创作。环境的压抑和内心的焦灼，使得写作时断时续。

最终，为了寻求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完成这部心血之作，他再次启程，远赴昆明。直到1943年，《火》的第三部才在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最终定稿。这部跨越5个年头、辗转万里、在炮火与流离中诞生的作品，其创作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角力的生命接力。



巴金《火》的多个版本，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藏。

作者供图

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文学画卷

“让它烧吧，中国人是烧不尽的，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火》第一部中，青年知识分子面对上海闸北漫天大火时发出的这句怒吼，如同一声惊雷，贯穿了整个三部曲。巴金通过3条相互交织又各具特色的叙事线索，构建起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文学画卷。

第一部《火》，聚焦淞沪会战至上海沦陷这段血与火的岁月。故事的主角是一群

原本生活在安逸环境中的知识青年，如冯文淑、朱素贞、刘波等。战争瞬间摧毁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轨迹，将他们抛入残酷的现实。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投身于伤兵医院的救治工作，在血肉模糊的战场上学习包扎与安慰；他们深入难民收容所，面对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同胞，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充满血泪的救亡实践中，他们完成了从懵懂青年到抗战战士的觉醒与蜕变。冯文淑毅然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决心投身前线的战地服务，她激昂地宣告：“我知道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不应该看重个人的情

感，我们要参加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这代表了整整一代青年在国难当头时的共同选择。

第二部《冯文淑》，将镜头拉向广袤的内地战场。冯文淑等人加入战地工作团，深入大别山区。这里的抗战图景与都市截然不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日寇的威胁，还有闭塞的环境、落后的观念以及动员民众的艰巨任务。小说生动描绘了他们如何克服困难，通过演讲、演出、识字班等形式，点燃普通农民心中的爱国热情。这一部分展现了抗战的群众基础，强调了人民战争的伟力。

第三部《田惠世》，则将视野转向相对稳定却又暗流涌动的昆明大后方。故事围绕基督徒知识分子田惠世展开。他秉持着博爱与和平的信念，在战火纷飞中独力创办并苦苦支撑着《北辰》杂志，试图在混乱中发出理性的声音，守护文化的火种。与此同时，第一部中的主要人物如刘波、朱素贞等也汇聚于此，继续着他们的抗争与思考。这一部着重探讨了在持久战中，不同信仰在民族救亡大背景下的碰撞、融合，以及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的坚守与困境。它揭示了抗战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精神与文化的持久战。

巴金笔下的人物，绝非简单的符号，而是承载着丰富民族精神的鲜活载体。在这些角色身上，跃动着巴金对“火中凤凰”这一意象最深刻的诠释，中华民族的个体生

命，在战火的残酷淬炼中，历经着毁灭与痛苦，但他们的精神却在牺牲与抗争中升华，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现出一种不可摧毁、愈挫愈勇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正是民族得以延续、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

巴金对《火》的定位非常明确，他直言这是一本“宣传的书”。在1940年为《烽火》杂志撰写的卷头语中，他的声音无比坚定，如同战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通过《火》中无数人物命运和抗争故事所传递的核心理念。这些薄薄的纸页，承载着千钧的重量，穿越封锁线，传递到前线将士、后方民众、流亡学生的手中，将一个个体孤立的个体生命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精神层面构筑起一道炸不垮、摧不毁的钢铁长城。

穿越80余载的岁月烽烟，《火》这部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作品，其生命力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消逝。它如同那只从烈火中涅槃重生的凤凰，其精神价值在历史的淬炼中愈发璀璨夺目。

今天，当我们重读《火》，苏州河畔那句“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呐喊，依然铮铮作响，穿越时空，激荡人心。巴金以生命熔铸的这部抗战史诗，早已超越了他自谦的“宣传之作”的范畴。它升华为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关头的精神图腾，一部以血与火写就的民族心史。

《火》所燃烧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抗争激情，更是穿越时空、烛照后世的不灭精神火焰。它永远提醒着我们，民族之魂，历劫不灭；信仰之光，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